

现代化首先是工业化，但远不止工业化。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全方位的社会变迁过程，除了经济生活的巨大变化外，包括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现代化带来的最为深刻的变化，就是中国文化的转型。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相伴随，思想解放就是用新的价值和观念取代旧的价值和观念，就是一种文化的创新和改造。因此，肇始于改革开放的新一轮现代化浪潮，决不仅仅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的推行，影响更为深远的后果，是新型文化的逐渐形成。不理解中国文化在改革开放后的深刻变迁，实难理解中国的新一轮现代化进程。改革

当代中国思想文化论丛

中国学者

论文化与文化转型

◎ 俞可平 / Arif Dirlik 丛书主编 ◎ 俞可平 执行主编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ZHONGGUO XUEZHES
LUN WENHUA YU WENHUA ZHUANXING

开放后，中国社会发生过许多重大的争论。在所有这些争论的背后，都隐含着不同文化和不同价值观的争论。当代中国的文化实际上由三种不同的来源组成，即中国传统文化、西方近代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这三种原本极不相同的文化，在当代中国奇迹般地组合在一起，融合成为一种新的中国文化。这一中国文化的重塑过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这三种不同的文化因子在当代中国文化中是如何组合的，这种新组合的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又是一种什么关系？读者通过本书，可以比较清晰地窥见当代中国文化的源流、形态、挑战和走向。本书力图展示21世纪后中国学者特别是关于中国当代文化的形成过程、全球化与现代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等方面的重要观点。

The following table shows the results of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for the dependent variable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are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Trust*. The table includes the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standard errors, and t-statistics for each variable.

100

1. **Introduction**
 2. **Background**
 3. **Methodology**
 4. **Results**
 5. **Conclusion**
 6. **References**

[illegible]



当代中国思想文化论丛

中国学者 论文化与文化转型

◎ 俞可平 / Arif Dirlik 丛书主编 ◎ 俞可平 执行主编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ZHONGGUO XUEZHE LUN WENHUA YU WENHUA ZHUANXING

编委会成员：蔡拓 Bruce Cumings Arif Dirlik 黄平 Richard Kraus 王逢振 王虎 俞可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学者论文化与文化转型 / 俞可平, (美)阿里夫·德里克主编.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229-12943-9

I. ①中… II. ①俞… III. ①文化史—研究—中国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07771号

中国学者论文化与文化转型

ZHONGGUO XUEZHE LUN WENHUA YU WENHUA ZHUANXING

俞可平 Arif Dirlik 主编

俞可平 执行主编

责任编辑: 秦 琥

责任校对: 朱彦彦

装帧设计: 蒋忠智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编: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6 字数: 266千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2943-9

定价: 4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当代中国思想文化论丛》

中文版总序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也同样体现在思想文化中。但是,相对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而言,中国的思想文化对国际社会的影响要小得多。尽管中国学者已经做出了许多努力,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发展,但除了少数专家之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依然所知甚少。特别是欧美中心主义的偏见,使西方学术界很少关注欧美国家之外的思想文化发展。例如,近年来我们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学术著作,但中国学者的论著在欧美国家用当地语言发表的则凤毛麟角。另一方面,我们则欣喜地看到,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扩大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的文化和学术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许多国外的有识之士已从单纯关注中国经济,转而开始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关注,包括关注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等各个方面。

中国的思想文化本来就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明的与时俱进,离不开学习和借鉴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反之,世界文明的多样化发展,也同样需要融入中国的思想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全人类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类面临的许多共同问题,需要各国学者的智慧和思考。文化的多样性成为全球性的内在要素。因此,本土文化与全球文化之间的互动和交流,比以前显得更加重要,也更为紧迫。

中国已经在世界政治与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的问题必然也是全球的问题;反之亦然。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对当前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以及中国领导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无疑是相

当重要的;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应当认识到中国思想界的复杂性,中国学者内部在一些重大问题上 also 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本论丛的根本宗旨之一,就是克服中外学者之间简单的“中—西”思维定式。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重庆出版社和荷兰的博睿(Brill)出版公司决定联合推出这套中英文的《当代中国思想文化论丛》。重庆出版社负责论丛中文版在中国的出版发行,博睿公司负责论丛英文版在欧洲和北美的编辑出版。我们还成立了一个国际编委会,由中国学者、欧洲学者和北美学者一起编选这套丛书,并由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教授和我共同担任论丛的主编。本论丛共分六卷,分别围绕中国学术界和国际学术界共同关注的“民主与法治”、“全球化”、“世界经济及中国的作用”、“和平与发展”、“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和“文化与文化转型”等六个热点问题,选取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一些代表性研究成果,翻译成英文,在中国与国外陆续出版发行。我们力图通过这套论丛,展现中国学者在一些全人类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上的观点和立场,从而让中国学者直接参与国际学术讨论,也让国际学术界更加清楚地了解中国当代的思想文化成果。

编辑出版这样一套中英文双语学术丛书,是一种将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新尝试,无论是编者和出版者都面临着许多重大的挑战。从主题的确定、文章的编选和合作的方式,到作者的版权、英文的翻译和编辑的技术,无不充满着困难。没有编者的执着、出版者的魄力和作者的合作,都会功亏一篑。在此,作为丛书的主编,我们诚挚地向《当代中国思想文化论丛》的中外编委和各卷主编、各位作者和译者,特别是重庆出版社和博睿出版公司,以及所有为论丛的出版作出过贡献的友人,表示深深的感谢。

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俞可平

美国俄勒冈大学资深教授 阿里夫·德里克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Arif Dirlik)

前言

1978 年后的改革开放,实际上重启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化首先是工业化,但远不止工业化。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全方位的社会变迁过程,除了经济生活的巨大变化外,包括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现代化带来的最为深刻的变化,就是中国文化的转型。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相伴随,思想解放就是用新的价值和观念取代旧的价值和观念,就是一种文化的创新和改造。因此,肇始于改革开放的新一轮现代化浪潮,决不仅仅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的推行,影响更为深远的后果,是新型文化的逐渐形成。不理解中国文化在改革开放后的深刻变迁,实难理解中国的新一轮现代化进程。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发生过许多重大的争论,在经济上有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公有制还是私有制之争;在政治意识形态有姓“资”与姓“社”、“马”与非“马”、“中国化”与“西方化”之争。在所有这些争论的背后,都隐含着不同文化和不同价值观的争论。当代中国的文化实际上由三种不同的来源组成,即中国传统文化、西方近代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这三种原本极不相同的文化,居然在当代中国奇迹般地组合在一起,融合成为一种新的中国文化。这一中国文化的重塑过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这三种不同的文化因子在当代中国文化中是如何组合的,这种新组合的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又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像是一个巨大的文化迷魂阵,等待着学者们去破解。

我编写本书的愿望是,读者通过本书,可以比较清晰地窥见当代中国文化的源流、形态、挑战和走向。因此,本书力图展示 21 世纪后中国

学者关于中国文化转型的若干代表性观点,特别是关于中国当代文化的形成过程、全球化与现代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等方面的重要观点。这些文章均发表在国内有影响的刊物上,其作者大多是中国著名的文化学者。编者对这些作者愿意将其作品贡献于本书,深表感谢。毫无疑问,在这么小的篇幅中,不可能将所有重要的文章均收录于内,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对此,敬请读者谅解。

俞可平

2014年2月13日于方圆阁

目 录

《当代中国思想文化论丛》中文版总序 / 1

前言 / 1

俞可平 现代化和全球化双重变奏下的中国文化发展逻辑 / 1

李翔海 中国文化现代化历程的哲学省思 / 22

赵 林 “国学热”的文化反思 / 37

彭永捷 当代文化建设中的儒教问题 / 49

郭齐勇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现代化 / 57

王光东 “民间”的现代价值——中国现代文学与民间文化形态 / 71

王 尧 如何现实,怎样思想?

——关于当代文学“思想状况”的一种认识 / 91

张清华 在历史化与当代性之间

——关于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状况的思考 / 104

王岳川 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的当代价值 / 121

王晓明 六分天下:今天的中国文学 / 144

王铭铭 我理解的“人类学”大概是什么? / 162

卓新平 中国宗教的当代走向 / 180

戴锦华 重写女性:八九十年代的性别写作与文化空间 / 189

潘 蛟 解构中国少数民族:去东方学化还是再东方学化 / 197

胡惠林 论20世纪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形成与演变 / 210

刘相平 对“软实力”之再认识 / 232

现代化和全球化双重变奏下的 中国文化发展逻辑

俞可平^①

全球化是一个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其基本特征是,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世界范围内产生一种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和日益加强的相互联系。全球化首先表现为经济的一体化,但经济生活的全球化必然对包括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经济全球化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交换方式,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而对民族文化造成极大的冲击。在中国,全球化对民族文化的冲击,突出地表现在继 19 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后,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内部再次发生剧烈的碰撞。这种碰撞发生在多个向度,既有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碰撞、保守与激进的碰撞,也有民族化与全球化之间的碰撞、中国化与西方化之间的碰撞。这些剧烈的文化碰撞,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引发了对文化的热烈讨论和激烈争论,所谓的“文化热”再度出现。本文将就中国知识界普遍关注的几个富有争议的文化话语作一简要的评析,以此来观照现代化和全球化双重背景下中国文化发展的逻辑、目前的现状及其未来的出路。

一、文化现代化

1978 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从历史发展的纵向来看,首先就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它实际上就是中国开始平稳地、全面地走上现代化

^①俞可平,1959 年生,浙江省诸暨市人,政治学博士,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主要从事政治哲学研究。

道路。现代化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变迁过程,经济上它追求的是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政治上它所要实现的是民主政治,文化上它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是自由、平等和人的主体性。从整体上说,现代化的这些政治、经济和文化要素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格格不入的。因而,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实现文化的现代化,便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上对改革开放所作出的第一个反应。

所谓文化现代化,就是要按照现代的工业文明、管理制度和民主政治的要求,对传统文明进行彻底的改造,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建设先进的现代文化,使之适合政治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的现实发展。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文化现代化,归根到底是社会现代化的需要,它是社会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现代化的社会生活和人本身,必然伴随着现代化的文化。文化的现代化主要是指在充分吸收以往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建立适合现代社会需要的新文化。经济及社会生活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和文化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三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但不能相互取代。”^①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批判性地改造传统中国文化,剔除其腐朽落后的糟粕,继承其合理有用的成分;二是向其他先进文化学习,借鉴和汲取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使之融入中国文化,成为中国新文化的内在要素。对于多数中国学者来说,上述两个方面对于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一方面,不断地引进西方近现代文化中的一切积极合理的因素,并结合中国的国情加以吸收消化,这是实现传统的现代化所绝不可少的;另一方面,同样必不可少的是,重新对我们的传统进行审视和筛选,使传统中的精华部分发扬光大、消极落后部分逐渐消除。“这就是说,建设现代化的、适应历史要求的新文化,固然离不开对于西方先进文化的学习,但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却是发现并弘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精粹。”^②但是,他们中间也有许多人在继承传统和学习西方两端之间各有侧重,提出了不同的文化发展道路,从而引发了激烈的文化争论。

对于一些人来说,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首先在于对传统的批判。尽管他们也不否认传统文化有其合理的内容和优秀的成分,但在

①齐振海:《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载《哲学研究》,1992年第6期。

②敏泽:《关于传统文化现代化问题》,载《哲学研究》,1989年第4期。

他们看来,就其主体而言,它与现代化是相对立的,是中国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最大障碍。特别是中国的封建主义专制文化传统,它扼杀人性,反对自由平等,重农轻商,重男轻女,是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天敌。不消除这些落后的传统文化,就无法使人们的思想观念适应时代的要求,就不可能有社会的现代化。著名历史学家黎澍在改革开放初的1979年即发表了一篇题为《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的长文,作者在该文中系统分析了反现代化的封建势力得以长期存在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根源,在感叹“在中国进行这样一场改变封建生产方式的思想革命,使人们乐意接受这种改变,实在比登天还难”之余,强调指出,“彻底完成五四运动时期开始的反封建思想革命,是实现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①这篇文章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先声。

与“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不同,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在批判传统文化时,不仅举起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旗帜,而且增加了一面“骆先生”的旗帜,即法治的旗帜。他们认为,我们现在所要实现的现代化,不仅要建立在民主和科学之上,而且也必须建立在法治之上。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法制(rule by law),但从来就没有法治(rule of law)的内容。法制与法治虽然字面差别不大,但其含义有实质性区别。法制强调严格依法办事,这在传统文化中从来就不缺少;但法治除了强调严格依法办事外,更强调没有任何个人或团体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的内容不仅是传统文化所没有的,而且与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是对立的。因为传统文化说到底是一种君主专制主义的文化,其前提就是君主超越一切法律之上。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不仅是民主和科学的需要,而且也是建立现代法治国家的需要。

二、文化复兴

如果说基于对传统文化批判之上的文化现代化,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地上出现的“文化热”的第一个高潮的话,那么,多少有点讽刺意味的是,接下去的另一个高潮则正好是与批判传统形成鲜明对照的“中华文化复兴”。文化复兴论者也同样主张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但他们不

^①黎澍:《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

是把推动文化现代化转型的重点放在对传统的批判上,而是放在对传统的复兴上。他们的基本主张是,从根本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并不与现代化相矛盾和冲突;中国在近现代的衰落,并不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恰恰是因为没有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仅不应应对传统文化采取否定性的批判态度,反而要把弘扬传统文化作为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中华文化的复兴与中国实现现代化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侧面而已。他们甚至还为这种“文化复兴”说找到了“强有力”的现实证据:在社会经济现代化方面获得巨大成功的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香港、台湾这四条“亚洲小龙”,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它们不仅没有对传统文化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反而努力倡导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

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大体上由三个方面组成。一是儒学的复兴,或称现代新儒学;二是中华文化的复兴;三是国学的复兴。三者之间既有联系,但亦有区别。三者对传统文化持基本的保留态度,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主张在基本肯定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新和改造,就可以使中华传统文化适应并且促进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事业。但三者强调的重点各有不同。新儒学把传统中国文化主要界定为儒家学说,倡导通过复兴儒学来复兴中国文化;中华文化复兴论者更强调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重要角色,希望中华文化重现历史的辉煌,期盼 21 世纪成为中华文化的世纪;国学倡导者则把着眼点放在传统文化的知识基础上,试图通过发现和传承中国古代经典的知识价值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以传承儒家“道统”、复兴儒家精神为己任的现代新儒学,肇源于 20 世纪 20 年代梁漱溟等人的思想。1949 年后,这一思想流派主要活跃于中国的香港、台湾和美国等地。20 世纪 80 年代后,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它也开始在大陆产生影响,并且出现若干有代表性的人物。^①当代大陆的儒学复兴论者不仅主张全面复兴儒家传统思想,而且力图将“转型”或“改造”后的新儒学作为指导中国现代化的主导意识形态,并认为这是中华振兴或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唯一出路。当代儒学复兴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蒋庆明确指出,中国近百年来之所以对内失去民族凝聚力、

^①参见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关于儒学复兴与现代新儒学的分期、代表人物、要点、意义及更多评价,亦可参见该书的相关篇章。

对外失去国际地位,根本原因就在于传统儒家精神和儒家伦理的衰落。并因此得出结论说,复兴儒学是中国大陆当前最大的问题,儒学理应恢复其历史上固有崇高地位,成为当今中国代表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与民族精神的正统思想。^①更有甚者,一些极端的儒学复兴倡导者干脆主张将传统的中国儒学发展成为“儒教”,“全国征收儒学遗产税,辅以强力措施种种,立儒学为‘儒教’,立‘儒教’为‘国教’”。^②

“中华文化复兴”论有两个基本出发点。一是认为,中华文化的兴盛与中华民族的强盛直接相关;中华文化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中华文化的鼎盛之期,也是中华民族的鼎盛之时。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引以为自豪的辉煌时期,曾经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中华文化也曾经膺服周边许多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之一。因此,从历史经验看,要使我们的国家变成现代化的强国,就必须复兴中华文化。二是认为,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华文化有着内在的优越性。正是因为没有充分发挥中国文化内在具有的优越性,我们的国家才变得日益贫弱。改革开放使中国重新走上了现代化道路:中国正在变得日益强大。但中国要真正成为世界强国,就必须使自己的文化走向世界,用自己的优秀文化去消除西方文化的种种内在缺陷。中华文化复兴论者的结论是,西方文化已经破绽百出,穷途末路,其统治世界的历史将要结束,代之而起的将是中华文化再度振兴,中华文化必将成为世界文明的主流。正像20世纪的梁启超等人充满慈爱地呐喊“大洋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③一样,张岱年、季羨林等76位中国文化研究者在2001年10月联名签署了《中华文化复兴宣言》(副标题为“为促进新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和平与发展而奋斗”),满怀激情和自豪地向全世界宣称:21世纪是中华文化复兴的时代!中华文化复兴,势不可挡!“当今全世界文化的冲突、邪教的泛滥、宗教的极端、自然的破坏、人性的恶化、科学的负面性等,都是社会安定和发展的阻力。然而要消除和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中华文化具有西方文明无法取代的作用。”“二十一世纪不仅是东西方文

①蒋庆:《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原载台北《鹅湖》杂志,第170—171期(1989年8—9月),见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425页。

②朱学勤:《2005年:中国文化之形色》,载《中国青年报》,2005年1月4日。

③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40页。

化交汇的世纪,而应当是从过去‘以西方文化为主流’转向‘以东方文化为主流’的世纪,复兴中华文化不是对西方文明的对抗,而是意味着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吸纳,创新出人类新文化,为人类开启新的文明。”^①

一般来说,国学是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系统知识体系。除了儒、释、道等传统思想流派之外,国学还包括中国传统的文学、兵学、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术数,等等。因此,倡导国学,实际上也就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的倡导者比一般的文化复兴论者更具有实践性,在复兴传统文化方面也更加彻底。他们把着眼点放在传统文化的知识基础上,把传统文化当作知识体系加以研究和传授,力图通过系统地整理、挖掘和教授传统文化知识,来传播和复兴传统中国文化。复兴国学的重要举措,便是开办大大小小的国学研究院、国学培训班等。2005年,在国学界最为轰动的盛事便是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开办国学院,并开始招收本科生。该校校长是这样介绍国学院的教学方案的:“教学方案还在制订过程当中。在外语等公共课之外,专业课主要分三大块。一些具体的课程正在制定当中,当然,‘四书五经’肯定是要念的,而且决不仅仅是儒家的东西,还有道家、法家、兵家、杂家等诸子百家的东西,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的那些经典之作都要学,而且还包括对经典的分析、评价性的内容。另外,西方科学也要学习。”^②此外,商界也成立了“中国国学俱乐部”;北京大学开办了“乾元国学教室”,俗称“老板班”,年收费24000元人民币。受知识界国学热的影响,社会上开始出现传统的“私塾”。

发人深思的是,上述种种文化复兴思潮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激烈的反弹,既有热情的拥护者,更有众多的批评者。一些温和的批评者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确有许多在今天看来仍有其重要价值的遗产,弘扬这些优秀的传统价值,对于我们实现现代化有其积极意义,因此,对于文化复兴思潮的积极作用应给以充分肯定。但中国传统文化就其整体而言,是与我们所要达到的现代化目标背道而驰的,试图把振兴中华民族的希望寄托于复兴传统文化之上,是注定要失望的。一些激进的批评者则直截了当地把上述各种文化复兴思潮统称为“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民族主义”。他们认为,从根本上说,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

①张岱年、季羨林等:《中华文化复兴宣言》,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8月18日。

②《人大校长详解国学复兴之路》,载《华夏时报》,2005年6月2日。

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根本阻力,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根本不足以证明儒学对现代化的促进作用,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出路不在于复兴传统文化,更不在于复兴儒学,而在于充分汲取其他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的优秀内容,建设现代的新文化。

三、文化自觉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全球化开始强烈地冲击中国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从而使文化讨论的语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些新的问题,诸如全球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何种挑战、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文化如何互动、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如何在全球背景下定位中国文化,等等,也逐一摆到中国知识分子面前。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一个新的文化话语在20世纪90年代后迅速在中国学术界扩散开来,进一步助长了中国知识界的“文化热”。这个新的话语就是“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由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1997年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首先提出的。他说,“这四个字正表达了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是人们希望了解为什么世界各地在多种文化接触中会引起人类心态发生变化的迫切要求。人类发展到现在已开始要知道我们各民族的文化是从哪儿来的?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他认为,无论是戊戌变法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在“破旧立新”的口号下,把“传统”与“现代化”对立起来,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作现代化的敌人。在他看来,文化的现代化不仅仅是“破旧立新”,而且也是“推陈出新”或“温故知新”。现代化一方面突破了传统,另一方面也是对传统的继承。这就涉及一个文化转型问题,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共同的问题。所以他说,“‘文化自觉’这个概念可以从小见大,从人口较少的民族看到中华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其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①。

诚如费孝通自己对“文化自觉”所作的解释那样,文化自觉就是为了

^①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载《学术研究》,2003年第7期。

应对现代化,特别是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挑战,寻找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出路。但是,“文化自觉”的本质是什么?其重点在哪里?如何更好地进行文化自觉?对诸如这样的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纷纷从各自的角度作出了不同的解释。

第一种是把文化自觉的重点放在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上,认为文化自觉的概念突出了文化建设对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对社会现代化的作用日益重要,文化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文化的力量已经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经济发展已经具备一定基础,制度建设已经有了基本雏形,能否顺利实现向现代文明过渡的文化发展,则是一个民族成功完成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所在。因此,文化自觉就是要自觉认识到文化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并且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自觉地调整和完善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在这些学者看来,“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本质性力量。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要素在经济发展和进步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全球化条件下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就是知识经济时代文化力的竞争。具有文化优势的国家,向世界输出的是价值理念、科学技术、生产标准、管理模式。处于文化劣势的国家,输出的是按照这些技术标准生产的产品。这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困境”。^①

第二种是把文化自觉的重点放在认识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文化的意义上,认为要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来看待中国文化。近年来致力于中国文化研究的学者甘阳指出,所谓“文化自觉”至少包含两层意思:其一,今天的中国人需要了解,中国经济的崛起并非仅仅只有经济史的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文明史的意义,这是与从前所谓“四小龙的经济崛起”完全不同的。现在全世界都把中国的崛起看成是21世纪的最大事件,尤其对西方来讲,中国的崛起对他们提出了是不是会改变600年来西方统治整个世界的格局问题,认为中国的发展可能会决定性地影响和改变整个世界格局。对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这种地位,中国人必须要有自觉的意识,要自觉地从世界文明史的高度来看中国和世界,要自觉地从世界历史的

^①王海光:《现代化语境下的文化自觉》,载《文汇报》,2004年9月14日。